良师益友
——缅怀王大珩先生

○徐端颐（1960机械）

我们的老前辈，我国著名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因病于2011年7月21日在北京去世了，由于我不在国内，在他病重时也未能去看望他，一直使我难以平静。

我第一次见王老先生是在1960年的冬天，刚参加工作不久，为了筹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光学仪器实验室，到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学习、调研。在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和加工基地后，我向接待的人提出,希望见一下他们的技术负责人请教几个问题。一天以后，我被邀见，在他们实验室大楼的一个普通办公室见到了王老。我根本没有想到王先生会亲自见我这等无名之辈，所以有些紧张和拘束。王先生带着和蔼轻松的微笑（后来我才发现他任何时候都始终带着这种让人感到亲切的表情），没有等我开口就说："你是清华来的？清华早就该设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了……"和我聊了一个多小时，中间多次有人来找他，也没有离开。在这次谈话中我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珍贵信息，更重要的是从他那里首次听到"光学系统设计已基本成熟，剩下的是算法和工具问题……"，"光学技术的工程应用要依靠实验研究，没有好的实验和加工基地什么都干不成……"这些对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长效指导性的意见。回校后，我把他的意见如实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，对清华精密仪器系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。对于我个人，由于受到王老的启迪，便全身心地投入实验室工作，甚至搬到实验室里住了7年，养成了长期在实验室工作的习惯，使我终生受益。

1990年王大珩先生到精仪系9003大楼参加徐端颐（左）负责的设备鉴定会时留影

光学领域的主要学术活动王老通常都会出席，只要有机会见到王老，总少不了请教他一些学术问题。80年代初，王老回到北京工作以后，和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，遇到重大的方向性的问题都少不了向他求教，不仅从来没有遭到拒绝，反而他把住址和住宅电话都留给了我。我觉得，王老最反感的是对他无原则的阿谀奉承，和想借他的声望达到什么其他目的，所以凡是和个人利害有关的事我都不会找他，不过也有两次意外：一次是1990年，我负责的一个项目，教育部要选送参加某国际展览，希望有一个能代表国际水平的权威

性的评价意见，我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去找他。我带了厚厚的一叠项目资料到王老先生家，在听了介绍以后，他只是简单严肃地回答说“我不一定能办得到，你们若不太着急就等我仔细看看这些资料再说”。大约一周以后，我正在实验室里工作时，门卫来电话说有一位姓王的老先生要找我，我到大楼门口一看，是王老一个人自己来了。他二话不说就要去看我们的实验系统，我提出去找学校领导来陪同一下，他坚决不同意。王老在实验室里看了近两个小时，完整地观察了实验设备的运行过程。离开时交给我一个名单说：“你把他们都请来对设备正式鉴定一下，我参加。但具体时间你得提前一周和我商定！”

另外一次是1999年，我有一本书，原名“光盘存储应用技术”，要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，由于是国防出版基金资助的出版物，在30万字以上需要特批，该书98万字，大大超出了此限。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希望我找一位业内著名专家写一个推荐意见，我又只好去找王老。由于这完全是个人私事难以启齿，同时也不愿意让他老人家为难，只是说请他随便看看，有价值就出版，没有太大价值就算了。这时王老的视力已经很差了，他拿着放大镜对书稿清样从头浏览了一遍，最后说“中国光盘工业已初具规模，是该出版一本工业界能用的书了……不过内容得进行调整，书名也不太好，得改一改”。我又用了半年的时间，根据王老的意见对此书进行全面调整和补充，并按照他的建议将书名改为《光盘存储系统设计原理》。他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阅读修改过的书稿全文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王老不仅同意推荐，还同意为此书作序。但更使我难忘的是，当我去取稿时，他递给我的竟然是他本人亲自手书的序言原稿。因为我早就知道王老写字已很不方便，就问站在旁边的秘书为什么不由王老口授，打印一下。他的秘书笑而不答，在送我出门时才交代说：“请将王先生的手稿交出版社，以他的手稿为准，一个字都不能改，否则不得使用他的署名。”

王先生是我国顶级的科学家，学识渊博，高瞻远瞩，对我国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就我本人的水平，根本不可能有效描述他的丰功伟绩。我写这篇小文章，只想介绍一点与王老接触中观察到的，使我感受最深的若干工作细节，王老为人处事的风格，特别是他对青年人的器重和关爱，不循私情、严谨的治学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使王大珩先生的治学精神永远传承下去。

贺清华八级毕业七十周年*

○王大珩（1936物理）

清华八级朝夕间
经历沧桑七十年
耄耋相会犹相识
畅谈复兴非等闲

*2006年，清华八级毕业70周年聚会，有10位同学参加。王大珩因病未能到会，特于聚会前致电八级联络人胡家驹，问候各位级友身体健康，并口述此诗以祝贺。